

结构化理论视域下腐败现象的形成机理*

杨森林¹ 任恒²

(1.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立足我国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借助结构化理论以尝试超越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或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容纳个体行动、时空互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剖析腐败现象形成的主体性、客体性以及结构性因素,揭示腐败现象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腐败者的个体短视行为是产生腐败的主体性因素,短视行为使其无法正确认识道德距离,进而忽视腐败的实际后果从而导致意外后果,同时腐败情境会促使个体产生腐败动机,这一动机又反过来激发个体的短视行为,腐败动机与短视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时间和空间作为客体性因素,对腐败者日常行为和互动产生影响,其在腐败行为中构成个体行动与互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对腐败有影响和催化作用,同时影响个体的分层模式。例行化为腐败行为提供参照和传播方式,区域化为腐败者提供表演空间和分区途径。资源的稀缺以及权力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加上规则的异化是腐败现象的结构性因素,资源稀缺催生行动者产生短视行为,规则异化为腐败互动提供例行化参考。结构性因素既是腐败行为的诱因,也成为腐败行为的结果。个体性因素、客体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腐败形成循环反复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而使得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消亡。

[关键词] 腐败 结构化理论 结构二重性 规则异化 策略行为

[中图分类号] D6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4)03-0096-09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强。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将“纪检监察学”正式列为一级学科学位〔2022〕15号),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内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相关研究已经升级至全新高度。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应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1](P69-70)]对此,学界十分重视对腐败现象的成因探究,并基于不同视角构建起一系列理论模式。譬如,政治学的权力缺乏制约及监督导致腐败^[2]、经济学的寻租理论^[3]、委托—代理理

收稿日期:2023-05-22;修回日期:2024-03-07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智库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研究”(2023GXJK131);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振兴计划2023年度项目“创新驱动视域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杨森林,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研究;任恒,副院长,特聘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论^[4]，社会学的人情文化视角^[5]等。但就多数研究而言，主要体现两种分析方式：一是制度分析，即暂时悬置行动者的主体性因素，集中考察制度及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规则和资源。二是行动分析，即暂时悬置制度分析，集中考察行动者如何利用规则和资源构成互动。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未能摆脱或超越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或行动与结构等预设的二元对立模式。因此，本文尝试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研究腐败问题，探索借助结构化理论构建主体、客体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于腐败以及三者影响腐败的作用机理。

结构化理论是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基于对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批判提出的，实际上它并非一组普遍化的解释命题所构成的理论，而是由一系列的概念框架所构成的分析工具。结构化理论是对吉登斯“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所谓双重解释，即“社会科学与自己的活动构成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人，存在交互解释的作用。”^{[6](P389)}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这使得有关人的社会行动无法完全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与它们所探讨的意义来推断或等同，所以社会过程的永恒的抽象定律是不存在的。基于双重解释，我们可以用结构化理论来分析很多社会问题，这给本文探析腐败现象提供一种理论可能。他反对将权力看作是附属现象，认为权力是人完成某种事务的手段，权力实施的媒介是资源，与权力有关的冲突和资源分配(瓜分)有关，资源的瓜分又导致社会系统中各种控制模式的形成。^{[7](P82-83)[8](P411)}他对权力的观点与腐败研究产生一定理论契合，基于此，本文利用结构化理论建构一个腐败问题分析框架，并进一步探析。

二、结构化理论与分析框架的建构

马克思的系统再生产和系统矛盾概念丰富

和发展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交往与互动的产物，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吉登斯继承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辩证统一思想，摒弃社会学上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的观点，重塑为结构的二重性，提出结构化理论。结构的二重性指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8](P522)}他认为社会结构不是实体性存在，只是存在看似结构的结构性特征，所谓结构只是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和资源，并且超越时空的限制。吉登斯与其他社会学家最大差别在于对人(行动者)能动作用的重视，为解决主体与“结构”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他构建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行动理论，即行动者的分层模式。

人的行动是一种绵延不断的行为流，行动者分层模式就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合理化(理性化)及动机激发过程视作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行动过程中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将会造成行动的意外后果，而行动的意外后果又进一步构成未被认识的条件。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它们习以为常的监控着自己所处情景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行动的合理化是指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合理性理解”。动机指的是激发某一行动的需要，其激发过程并不与行动的连续过程直接联系在一起，动机对应的是无意识，只有在较不寻常的背景中，在以某种形式偏离于惯例的情境下，动机才可能直接作用于行动。^{[8](P66)}影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主要客体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核心。行动者的互动与时空连接起来，形成两个分析性概念——例行化和区域化，这是理解结构化理论“秩序问题”的关键。例行化是行动者在进行日常实践时总是遵循行动者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例行常规。^{[9](P56)}行动者互动模式的例行化使其在时间上保持延续，

使行为具有可预见性,由此可产生本体性安全感。^{[10](P459)}区域化指的是在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各区域在时间、空间或时空上的分化,这使行动者可以在不同场所和不同情境中采取不同的行动。

结构可以概括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同时,行动者通过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出结构。^{[10](P451)}其中规则是社会互动中的“方法性程序”,即便行动者对规则只是含糊了解,也不影响规则指引他们的行动,规则是行动者知识能力的一部分。规则分两类,一是规范性规则,通过代表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来表达行动的合法性。二是解释性规则,基于互动双方都认可的解释框架和知识基础来体现行动意义。资源可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在行动者可支配的资源中,若能支配物质资源,则表明其拥有配置性资源,若能支配他人,则表明其拥有权威性资源。其中,规则与资源都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与中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的不同模态。概言之,结构化理论通过上述一系列概念,将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联结起来,超越传统社会学中预设的二元对立关系,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腐败问题的新工具和视角,基于此,本文根据结构化理论,建构一个腐败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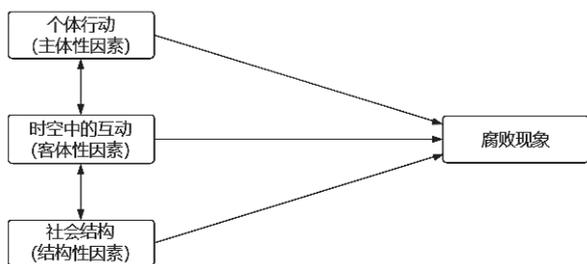


图1 腐败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腐败现象的主体性因素分析

(一)腐败: 个体短视行为的意外后果

腐败行为通常不能立即看到腐败的道德

后果或得到惩罚,腐败行为与其道德后果之间的距离称为道德距离,造成道德距离有两种情况,一是腐败后果受未来时间影响而产生,称为时间距离,二是腐败后果受组织机构层级和运作机制影响而产生,称为结构距离。^[11]通常而言,若个体能够预见道德距离(即受到应有惩罚),则个体趋向避免腐败,这表明腐败是由个体的“短视”行为所致。对于上述情形可借鉴默顿(Robert K. Merton)^[12]的观点,将贪腐行为与时空中制度化实践相联系,即可产生下列三种情况。

其一,从反事实的角度,追溯考察这一系列事件,重点在于把握首个事件在因果顺序上作用,即腐败者对“第一次腐败”的处理上。例如,一些行政人员并非有意参与腐败,碍于人情、面子或某种私心“帮助”某人,但事后受惠者回报其以重金,长此以往该行政人员则将收礼办事视作例行化操作。这表明,首次腐败行为发生而没有受到即时的惩罚,对于腐败者形成例行化腐败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这种情况通常是腐败者看不到时间距离所致。

其二,腐败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的意外后果。这种意外后果可能由单一行动者每一个理性行动的过程积累,也可能由不同行动者分别近乎理性行动相叠,但其最终后果对于个体而言却可能是非理性的,这就是“偏离效应”。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部分国有企业活力引入民营资本,却因此失去控股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为推进城镇化,压缩工程时间,导致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产生工程质量不过关、工程烂尾。又或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政策过于宽松、优惠导致不良贷款增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市场稳定等。发生上述情况前,往往地方政府及其主政官员初心是促进地方发展,但在实际运作中隐藏着一系列经济理性占上风的腐败行为,最后导致多人落马,这些腐败者多是不能看清结构距离。

其三,自身或他人的腐败行为以某种因果循环的形式,构成自己进一步腐败的条件,其中

隐含的是制度化实践再生产的机制。当公职人员未产生腐败行为时,通常认为自身不可能产生腐败行为,而真正将其置身类似情形时,也同样走上腐败道路。进一步而言,若一个地区政治生态被破坏,则产生了公职人员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腐的情况,上述情况产生的道德距离多是时间距离和结构距离混合在一起。这表明定位在某一时空情境里的重复性活动,会在相对自身情境较为遥远的时空情境下产生例行化的后果。腐败是例行化的附带结果,也同样以一种例行化的方式被“分播(distributed)”开来,而参与者在反思性地维持这些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看待它们的。^{[8](P75-76)}

(二)个体短视行为的生成过程

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这个安全体现行动者在例行活动中某种自主性。^{[8](P120)}行动的无意识部分是在维持本体性安全,减少焦虑、得到信任感。埃里克松^{[13](P247-256)}(Erik H.Erikson)认为这种心理机制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形成。在孩童构建自主性且不断增长的进程中,不断为行为的反思性监控能力奠定基础。^{[8](P129)}即婴儿人格与成年人格中动机成分基本是源于避免焦虑、维护自尊、防止被羞耻感和负罪感浸没等某种普遍化倾向,而行动者通过反思性监控,无意识的维持着本体性安全,为的就是减少“焦虑”,并且行动者会基于自己知识库和解释框架的理解,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合理化,这些都是出于本能的。通常情况下,行动者的动机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在腐败情境中,动机就会直接作用于行动,因为动机激发是由于腐败偏离正常惯例,当腐败动机产生,行动者就会参照腐败惯例。此时行动者的行动不再是本能,而是基于实践意识进行反思性监控,并受到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影响进行合理化,行动者将努力地考虑行动条件和可能的意外后果,并不断地进行合理化来安慰自己。

斯特里奥斯·泽格利多普洛斯(Stelios C.Zyglidopoulos)和彼得·弗莱明(Peter J.Fleming)利用“破坏性连续体”和“道德距离”

对组织内腐败进行研究^[11],对于我们理解腐败中行动者分层模式有一定借鉴意义。破坏性连续体是指在外环境作用下,正直的公民可能成为行为最邪恶的罪人。泽格利多普洛斯和弗莱明认为“破坏性连续体”作为一般性原则,也适用于腐败中常见类型,并提出在腐败的连续体中,包含四个阶段或称四种类型,即组织中无辜的旁观者、无辜的参与者、积极的合理化者和犯罪者,在腐败连续体的四个阶段之间都存在道德距离,并可能在不同阶段过渡中起决定性作用(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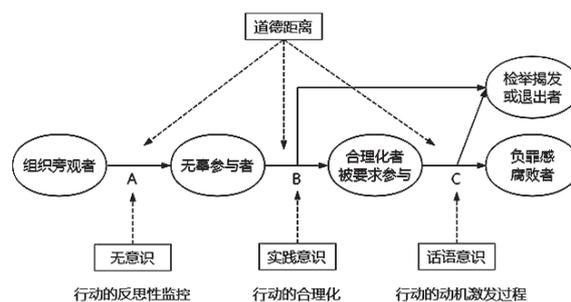


图2 腐败连续体中的行动者分层模式

腐败连续体可以看作是行动者在腐败过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行动者在整个连续体中的行为也存在分层模式,反思性监控是个体行动本能,避免自己处于焦虑中。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参与腐败时,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当他面对腐败时,如果受到某种动机(如:金钱、权力或者名声等)激发,并受该动机直接影响,便会采取短视行为走向腐败。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个腐败者都经历以上四种阶段,通常情况,腐败者会处于某个阶段或经历某几个阶段。若四个阶段道德距离很短,则整个过程可看作是一个行动者分层模式,若各阶段道德距离较长,那么行动者每经历一段道德距离都会进行反思性监控。道德低下的行动者能够提前预判“行动的未被认识的条件”,将自身伪装为“被动的腐败者”,即在腐败中“搭便车”,将自己的腐败行为伪装成听命行事。反之,道德高尚的行动者则在预判可能成为被动的腐败者时,便会选择退出。行动者若在C段处选择退出或检举揭发,可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

的,则说明腐败已经成为该领域(区域)的组织原则,而当行动者处于C段决策点上,明知腐败后果却仍选择腐败,说明行动者已有足够的动机并完成合理化,此时腐败虽然是短视行为,但对该行动者而言却已然成为一种主动行为。

四、腐败现象的客体性因素分析

腐败现象的客体性因素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与空间本身并没有直接影响腐败现象,而是对腐败者日常行为和互动产生了影响,其影响结果就是使腐败者的行为产生例行化和区域化,这里着重分析例行化与区域化对腐败的影响。

(一) 例行化为腐败行为提供参照和传播方式

例行化继承并发展了戈夫曼有关例行常规活动的观点,例行化指纷繁复杂的整个日常生活活动的习惯性、不言而喻性,其中盛行的各种熟视无睹的行为风格与形式,它们既有助于增强本体性安全,又为后者所巩固。^{[8](P525)} 例行化使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因此可以产生本体性安全感,而互动模式的例行化在时间上保持延续,从而再生产出结构和制度。例行化使个人行为形成惯例,惯例在结构和行为互构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它既是互动双方基本信任的纽带,也是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例如我们常说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开口不骂送礼人”。例行化使腐败者行动时会参考历史上的惯例和身边的惯例,同时,腐败者的行为也会成为其他行动者参考的例行化案例。所有的腐败行为作为前置惯例不断地构建着社会的“规则”即潜规则,社会结构通过生产和再生产使惯例和“规则”随时间扩展开,最终形成腐败的制度化。

腐败是一个互动过程,是依次发生的带有序列性的一系列行动,这意味着腐败存在一个开始的标志,这个标志可以是人际的,也可以是物质的。自体腐败可以看作自己与自己的互动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反思性监控与合理化的过程。例如,在招投标或人事任免的腐败过程中,项目招标公告发出后或人事岗位空缺

后,符合条件的候选者会与掌控决定权的人“对话”,这里的对话就是互动开始的标志。实际上,已有腐败惯例的双方进行互动时,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声音都有可能成为腐败互动开始的标志。通常情况,双方开始只是就非腐败的普通话题进行交谈或问候,这是双方维持各自本体性安全需要所进行的高度例行化行为,在涉及腐败互动中,当双方都取得基本信任,即确保本体性安全后,交谈过程会有一个转向环节,将话题过渡到腐败相关的事由上。行动者,通常为下位者或行贿方,基于自己模糊的“库存知识”和实践意识建构谈话次序,这是为维系本体性安全和制度情境的需要。腐败互动中的上位者,也会基于安全意识和制度情境进行惯例对话,回应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或者拒绝的,取决于这个上位者的惯例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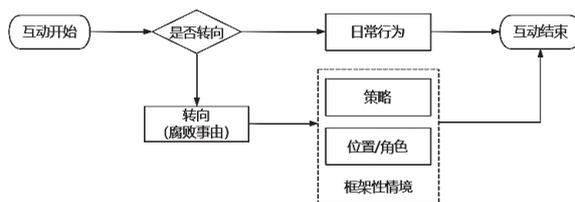


图3 腐败的框架性情景

若谈话未发生转向,则本次互动仅为一次普通的日常互动或寒暄,若情况相反,互动仍然流畅,那么双方就会调整互动策略,利用策略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姿态和相对定位,以此来维持各自的本体性安全和社会秩序(见图3)。实际上双方做的都是例行化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按套路出牌”,如果其中一方不按“套路”出牌,将破坏互动中的舒适感和有序意识,从而破坏对方的安全意识,使对方产生焦虑。上述“框架性”情境并没有明确的框架或规范,如同我们生活中遇到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或风俗习惯时所处情境,表示互动倾向框架化。这里的位置与角色差不多,用来表示行动者在互动中的社会定位以及所在情境中的社会身份,行动者处于怎样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利于相互信任和维持社会结构感。比如腐败

双方是官商,官员有职位,有权有责;商人有金钱和企业需求,商人需要官员批准才能承接工程或项目,正是因为存在这样定位,整个互动就能够被例行化,同时构建社会结构感。他人的例行化腐败行为会催生自己腐败的动机,同样,自己的例行化腐败也会成为他人腐败的参照,正如前面提到第三种情况,例行化如因果循环一样被分播。

(二) 区域化为腐败者提供表演空间和分区途径

社会定位过程离不开具体情境,腐败者之间互动也离不开具体情境、场所,不同的情境会产生不同的互动、不同的结果,场所利用空间为互动提供各种场景,同时,场景又是限定互动情境性的重要因素。^{[8](P205)}场所的典型特征通常是在内部实行区域化,这对互动情境构成很重要。区域化不仅体现空间性,还体现时间性,因为在不同时间段上,同一场所的作用和功能可能不同,更主要是形成的互动情境也不同。区域化的一个特性就是不同人在不同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展示和隐藏的内容有所不同。通俗来讲就是行动者在不同场所、同一场所的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境都可以扮演不同角色,对腐败现象而言最典型的的就是“两面人”。这里称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见图4)。区域化提供一个时空闭合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可以保持一种相互分离关系。^{[8](P213)}



图4 区域化的前台与后台分化

腐败者通过区域化构建维持自己行动的情境性,维持其本体性安全。前台与后台两个区域并不是完全吻合自我的“封闭”与“暴露”,两个基轴的运作依靠的是权力、规范和意义所构成的复杂关联。^{[8](P215)}一般而言,后台区域形成可产生权力交易的资源,腐败者可以反思性地利

用这些资源,从而得以在他们自身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和“正式”规范所提倡的解释之间保持一种心理距离。现实中,在公众或领导和同志面前,有些腐败者堪称为人师表,饰演的是一位先锋模范甚至是反腐斗士。而在腐败活动中,他们则暴露贪婪的嘴脸,饰演的是唯利是图的蠹虫。即便在同一场所,腐败者面对同志和同伙也是不同的,他可以在不同的情境随意切换自己的角色,甚至他的前台和后台都只是刻意暴露的角色,这些角色都不是真实的他。

区域化还可体现中心(或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这种分化可以体现在具体地域上,但更主要的方面是与时间的根植性联系起来,分析群体的中心与边缘区域,这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核心与边缘”分析是异曲同工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别离不开时间上的持久性,那些占据中心的人已掌握对资源的控制权,这是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边缘区域的人分化的根由。已经确立自身地位的人或局内人(established)可以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封闭,借以维持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而其他则被看作是下位者或局外人。^{[8](P222)}当腐败者及其同伙聚集形成群体,并由此产生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分化,越是腐败群体中心的人,越是掌握着更大的权力和资源,甚至会产生一个由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小圈子”。通常情况这个小圈子会产生分工合作,也是整个腐败群体中的首要群体,是真正的“局内人”,其他腐败者或群成员为了各自目的会向中心区域靠拢,最终区域化促进腐败例行化的传播,例行化又促进腐败形成制度化。

五、腐败现象的结构因素分析

(一) 资源的稀缺

资源是产生权力的基础,也是产生冲突的根源,一切腐败活动都是源于对稀缺资源的竞争。腐败依据所支配资源的不同,可分为配置性资源腐败和权威性资源腐败两大基础分类。常见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等情况所涉

及资源都是配置性资源,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支配或插手配置性资源的分配与调动,这些都属于配置性资源腐败。每一项配置性资源的支配都面临N个选择,资源与竞争者的关系比例是1:N,正常情况每个竞争者得到资源的概率是 $1/N$,如果竞争者与腐败者勾结,那腐败者会给该竞争者一个信息,使竞争者得到资源的确定性增加,他拿到资源的概率也会远高于其他人,而其他人得到资源的概率则趋于0,最后,其他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竞争的“陪跑者”。

在权威性资源腐败中,同样存在资源稀缺情况,如人事录用、职务晋升、代表选举等都是腐败者通过操控权威性资源,即对人的支配和影响实现腐败。我国各级公务员职位与权威构成一个等级制金字塔,在官僚制中职位越高,位置与官员的数量越少。^{[14](P131-145)}这意味着行动者每晋升一级都要面对多个同级或同层次竞争者,资源与竞争者比例存在1:N的情况,无论是人事录用或是代表选举都是一样,其中的“资源”或名额总是有限的、稀缺的。还有很多腐败混合控制两种资源,一方面腐败者直接影响和调控配置性资源,另一方面操纵权威性资源、安排自己人,从而更好地控制配置性资源,这种混合型腐败多具有一定规模和系统性。资源的稀缺性本身以及越靠近控制链顶层对资源控制能力越大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个体理性和行为动机。

(二) 规则的异化

规则指导人们的行为,规则出现异化,人的行为必然失范。基于人情交往的规则发生异化最容易导致人情腐败,人情腐败最初大多是先有行政行为,而后腐败。可能公职人员并无腐败的初心与本意,仅仅基于某种人情关系而“成人之美”,主观上并未企图从中谋取好处,而事后行贿者逢年过节赠送一些“礼物”,久而久之演化为行贿受贿,事情性质和结果发生质变,这与中国社会传统和习俗有一定关系。风俗习惯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在我国的人际交往中随处可见,构成了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情法则仅应当用来维持社会交换而非经济交换,因为经济交换并非人情为中介,而是以钱为中介。^{[15](P153)}而腐败者的人情规则已掺杂经济利益,已经改变原有的人情味,人际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熟人关系,而是披着“人情”外衣的利益关系,不仅如此一些熟人关系还可能异化成情人关系,人情法则演变为“权色交易”,这都是传统惯例和人情法则的异化,是历史潜规则惯性和腐败例行化的结果。

腐败中较常见的是“权钱交易”。无论是涉及人还是涉及物的腐败,所涉及的资源等级越高,权钱交易价格越高,呈现出明显正向相关特征。这种规则提供一种序列式参考方法,即下位者或行贿者只需要按照“价格公式”,根据自己希望获得的权力或资源,向权力者输送对等的“价格”。当这一规则被例行化分播后,会进一步异化出“竞价机制”,即多人竞争同一“资源”时价高者得。当某些地区在行政人员招聘时忽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规则,转而采取异化了的“规则”时,该地区政治生态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极易出现“塌方式腐败”。

当腐败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产生系统性时,便会催生新的群体规则。基于腐败者的“共同文化”会产生一个理性约定,表现为一种构成性或管制性规则,这种规范可能以成文或不成文的形式出现在群体中,如某些腐败群体伪装成某个协会或组织,并制定一个规则或章程,这种规则既有管制性又有构成性,若达不到条件,就无法取得入会资格,其目的是为克服群体成员的“随意性”^{[16](P67)}当腐败群体形成后,通常会有一个或几个权力比较集中的人构成整个腐败群体的中心区域,同时群体内部也会产生首要群体和次要群体,一旦加入该群体便不可随意退出,否则会导致整个群体的打击和报复。腐败群体通常并非由于单一事件形成共同腐败,而是不断通过群体规则引导群体成员做出符合群体趋向的行为选择。在群体中通常会依据事务重要性、人物重要性或权力的集中性等指标评出优先级,优先级越高的事情越先

得到资源，甚至牺牲部分群成员的利益来保证“整个群体”的利益，群体利益得到保证后，便会在接下来的事情中“补偿”先前让步的群成员。上述仅列举几种规则异化情形，在腐败不断发展演化过程中，会不断催生和异化新的规则，但在实际情况中，腐败行为往往不是依据单一规则，而是在多个规则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三) 结构的二重性

规则指引行动，而行动需要处理事务的权

力，权力又来源于物资配置和组织能力，行动结果又催生新的规则和新的资源分配。两类规则与两类资源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组合共同构成结构丛，在纵向上看，结构丛元素表示起主导作用的规则和资源，结构细化表示规则和资源的组合方式。由于规则和资源的“中介性”和“可转化性”，使它们成为人们互动的中介，从而产生不同的腐败形态并影响和破坏相应制度（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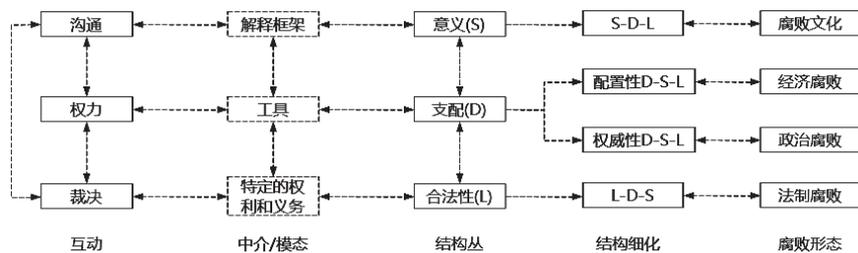


图5 腐败现象的三维结构

从横向上看，当腐败双方进行沟通时，解释性规则(S)起主导作用，例如，腐败行为中，行贿人以“年货”“土特产”等名义送礼实际上是潜规则中的“符号”(S)，沟通双方都可以相互理解其意义，实现沟通目的，从而形成腐败中的沟通模式(符号制度)，腐败中的沟通模式实质是构建一种腐败文化，腐败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互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当腐败中权力发挥作用时，则需要支配(D)权威性资源或配置性资源，支配资源构成了权力作用的中介。若权力支配的主要为配置性资源则多为经济腐败，如官商勾结，主要影响和破坏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若权力支配的主要是权威性资源则多为政治腐败，如人事腐败、选举腐败，主要影响和破坏行政秩序和政治制度。当互动中展现裁决或约束时，结构中的规范性规则(L)起主要作用并构成裁决合法化的中介，这时腐败多表现为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即破坏法律制度，常见如司法腐败和自由裁量权腐败。

概言之，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工具，建构个体行动—时空互动—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对腐败现象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经理论分析可知腐败现象产生受到个体性因素、客体性

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见图6）。首先，腐败者短视行为是产生腐败的主体性因素，短视行为使其无法正确认识道德距离，进而忽视腐败的实际后果从而导致意外后果——腐败，同时腐败情境会促使个体产生腐败动机，动机又反过来激发个体的短视行为，腐败动机与短视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次，时间和空间作为客体性因素，在腐败行为中构成个体行动与互动的例行化和区域化，历史惯性和周围人惯例操作产生例行化，为腐败者提供行动参照，区域化给腐败者区别对待不同组织和人提供安全区域，并且使腐败群体形成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例行化与区域化对腐败有影响和催化作用，同时影响个体的分层模式。最后，资源的稀缺以及权力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加上规则的异化是腐败现象的结构性因素，资源稀缺催生行动者产生短视行为，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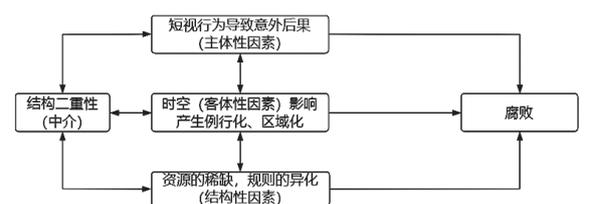


图6 腐败现象形成机理

则异化为腐败互动提供例行化参考。结构性因素既是腐败行为诱因又是腐败行为结果。个体性因素、客体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腐败形成循环反复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也是腐败现象难消亡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陈国权, 曹伟. 权力制约监督的制度功能与现实意义[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9): 159-165.
- [3]倪星. 论寻租腐败[J]. 政治学研究, 1997(4): 21-29.
- [4]程同顺, 李秋兰. 腐败的委托——代理分析[J]. 唯实, 2004(12): 70-73.
- [5]柯珠军, 岳磊. 人情视角下我国腐败行为的文化透视[J]. 开放时代, 2014(2): 10, 210-223.
- [6]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7]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 田佑中, 译. 北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8]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9]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0]乔纳森·H. 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7版)[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 [11]ZYGLIDOPOULOS S C, FLEMING P J. Ethical distance in corrupt firms how do ocent bystanders become guilty perpetrator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78(1-2): 265.
- [12]MERTON R K.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J]. America Sociological Review, 1936, 1(6): 894-904.
- [13]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M]. New York: Norton, 1963.
- [14]MARSDEN P V, LIN 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1982.
- [15]汪凤炎, 郑红. 中国文化心理学(第3版)[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16]潘天群. 合作之道——博弈中的共赢方法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刘红娟】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YANG Senlin & REN 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era background of China's increasing efforts in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and corruption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structured theory, we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model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subjects and objects, or actions and structures,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accommodates individual actions,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analyze the subjectivity, objectivity,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corruption, and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its forma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hort-sighted behavior of corrupt individuals is a subjective factor that leads to corruption. Shortsighted behavior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moral distance, thereby neglecting the actual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and leading to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Time and space, as objective factors, constitute the regular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corrupt behavior, which have an impact and catalytic effect on corruption, and also affect individual hierarchical patterns. Regularizat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means of dissemination for corrupt behavior, while regionalization provides performance space and zoning channels for corrupt individuals.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 and the ability of power to control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alienation of rules, are structural factors of corruption. Resource scarcity leads to short-sighted behavior among actors, and the alienation of rules provides routine reference for corrupt interactions.

Keywords: corruption;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duality of structure; alienation of rules; strategic conduct